

小院春秋

谢其章

我在北京曾经住过两个四合院，一个至今尚完整地存在，一个已经完全不在了。存在的这个院子，唤不起我一点儿的记忆，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到一岁。那个已经不存在的院子，却完整而清晰地存在我的记忆里。

1950年代初，父亲母亲带着姐姐和我从上海迁居北京，刚开始父亲单位将我安排住在东城西总布胡同7号，7号是个两进的院子。十几年前父亲和姐姐重返7号院，与现在的住户聊了很久，还拍了合影。前几天我忽然在《北京四合院普查成果与保护》一书里看到7号赫然在焉，是这样说的：“二进院正房三间，前出廊，明间吞廊，硬山顶，清水脊合瓦屋面。”我家住正房西间，“明间吞廊”即中间那间凹进去一块，正好给西间和东间留了独立的门。“明间吞廊”样式的房子，我见过的很少，其实我没有真正住过，父亲说我和妈妈住在院子另外一间房子。

家里有一本老相册，其中一张老照片的谜最近才解开（见右图）。照片是120相机拍的，房门前三层石阶，错落站着四排小孩子，惟一坐板凳的是我，抱着个饼干筒笑着。第二排是四个小女孩，姐姐在内。最后一排站着个穿旗袍的阿姨，高个子，睥睨地望着镜头。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张托儿所的照片，误读了几十年。最近偶然跟父亲说起，他告诉我这些小孩，都是他单位同事的孩子，都住在7号，那个高个子阿姨并非托儿所阿姨，是某同事的爱人。父亲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还指着阿姨前面的那个小女孩说，她后来演过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我马上在电脑上调出《野火春风斗古城》来看，一下子就对上号了，这位小女孩就是饰演韩小燕的王俊童。韩小燕那句台词多脆生，冲着周大伯（邢吉田饰）嚷：“光顾杀棋，回头就别吃（饺子）！”

7号院住了不到一年，单位将父亲安排到西城太平桥大街的按院胡同60号。60号在路南，北京的好宅子讲究坐北朝南，因此路北多为高门大户的院子，西总布7号在路北。父亲进了按院胡同以为60号也像7号似的气派，跑到路北的一家大宅门咣咣拍门，出来一个门房告诉父亲找错了门，60号在对面路南呢。

在老北京，能够横跨两条胡同的宅子才算得上“庭院深深深几许”之豪宅，父亲拍错门的那座大宅，前门在按院胡同，后门开在学院胡同。按院胡同是东西向，里面还穿插着几条南北向的短胡同，60号就在短胡同里，很隐蔽的大门又在短胡同里拐了个小弯。按院胡同在明朝的时候叫“巡按察院胡同”，因“巡按察院”衙署而得名。经历几百年沧海桑田，最初的房屋院落大变模样，不变的只是胡同的东西走向。据我的考证，60号的房子是1926年建造的。

60号院子的格局是这样的：门洞右手是一小间，约六平米。门洞往里迈上两步就是西房的山墙，山墙上做了个“假”影壁。再往左拐两小步是两间小房子，一间六平米吧，另一间三平米有门没窗，后来才知道这小间原来是茅房。可别小看这三间小房，它们可都是朝阳的，每天日照不少于四小时吧。西房三间和南房五间里的



照片是120相机拍的，房门前三层石阶，错落站着四排小孩子，惟一坐板凳的是我，抱着个饼干筒笑着。第二排是四个小女孩，姐姐在内。最后一排站着个穿旗袍的阿姨，高个子，睥睨地望着镜头。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张托儿所的照片，误读了几十年。

一间半共同组成了60号的外院。父亲单位分配给了我西房三间和门洞左右两小间。四口人加上奶妈和保姆，住得还算宽敞，父亲尚能布置出一间书房。厨房设在门洞右手那间，窗下有个自来水龙头。左手那小间或奶妈住或保姆住。外院和里院隔着一道墙，中间有个漂亮的月亮门，外院曾经植过一丛翠竹，这些美景都是大人讲的，我不曾记得。

里院由北房三间，东房两间，南房三间，另有几间很小的耳房围成。房东住大北房，我不曾记得进去过。四合院，潜移默化地教会你明白等级的存在。整个院子只有外院有一棵树，一棵枣树。秋天果实累累，终于有一

天房东太宣布打枣，房东一家人连打带擦，然后赏给每家一小盆。父亲讲东房曾经一度租给我家使用，房东大儿子结婚客人多还借东房摆了两桌酒席。老北京有个讲究“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60号的东房夏天很遭罪，西晒使得屋子像蒸笼，南房相对好一些，而且南房是全院惟一有后窗户的屋子。南屋后窗户外面是个夹道，夹道的那边是所著名的中学校，院子里学习好的男孩子考上这所中学，课间休息十分钟都来得及跑回家一趟。我弟弟是196分考进去的，近有近的坏处，弟弟的同学一放学先到我家聊天，弄得人声鼎沸，然后一哄而散。弟弟同学的名字及编号至今

我还能记住不少，他们也始终没有忘记我，一种别样的温馨记忆。

有那么两三年，院子里家家栽葡萄，北屋和我家是紫葡萄，南屋栽的是绿葡萄，小颗粒，比紫葡萄串紧密，甜中带酸。有一年，我家葡萄丰收，正赶上老邮递员来，真诚地请他吃上一串。父亲在外地工作，所以我家信和汇款单比较多，从小听惯了邮递员的喊声“某某某，拿讫！”

说起葡萄，还能勾起一件往事，我家保姆把我们从小带大，后来她去南郊果园工作，每年初秋都忘不了送来一大筐的葡萄，大吃特吃，真过瘾，那时候的葡萄似乎比现在的葡萄味道正。

有一年，我家在窗前种了几株老倭瓜，这种瓜很好养，不用精心伺候，旱涝不计，院子地方小，它的秧子爬上房顶一样果实累累，华于春者实于秋，大小一共结了32个瓜，姐姐挑了一个最大的送给小学校老师。

60号小院三十多年的生活，以我到农村插队为分界，上面所说为前半截。我插队之后每年冬季闲回家一趟，住上三四个月。此时的小院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住户多了两家，里外院的隔墙拆掉了，旧的称呼“太太”

“马妮妮”听说我回来探亲，颤巍巍地来问问我：“大弟回来了，那边生活怎么样？”这一年的二月，母亲去世，家里只剩了上初中的小妹，五间房只好退租了三间。退掉的三间马上住进了三家。几年后我们返城，两间房一时人满为患，行军床派上了用场，我呢，则尽量争取在单位值夜班。日子像流水一样的一天重复着一天，直到我在小院结婚生子，终日菜米油盐，锅碗瓢盆，连果实累累的枣树竟亦无暇抬头望上一望。

笔会

天边的云彩

(装置)

唐承华



一座很像大脑的建筑

毕淑敏

瑞士歌德大殿，据称是一座很像大脑的建筑。未去前充满疑惑。我当过医生，知道人类大脑的解剖，想不通一个冰冷建筑，何以比拟大脑？有脑积液？有脑沟回？有神经中枢和网状纤维？……

人们多以为这座建筑，得名于歌德。其实他老人家根本不知道大殿的存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生卒年是1749年8月28日到1832年3月22日，活了83岁，在那个年代要算高寿。即便如此，那时歌德大殿还踪影皆无，它只是瑞士巴塞尔地区一块名叫多纳赫的荒凉山坡。大殿完工于1928年，不但距歌德逝世96年，就连大殿的设计者——鲁道夫·斯坦纳先生，也已去世多年。

斯坦纳1861年2月27日生于奥匈帝国。1882年，21岁的他，意气风发地编写了一本关于歌德科学研究内容的《歌德科学》。魏玛档案馆注意到这本书，于1888年录用了斯坦纳，让他专门编辑歌德与席勒的著作。歌德成为斯坦纳建构自我世界的精神导师，他想修建一座建筑，向自己引路人致敬。

斯坦纳的建筑哲学被称为“有机建筑”，它包括硬结构、心理氛围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之活动诸方面。斯坦纳设计的歌德大殿蓝图，最早是木制结构。不料整体完工的第二天，被狂徒人为纵火，将大殿毁于一旦。斯坦纳立刻决定原地重建，一切照旧，只是改为水泥材料，以防再次被毁。那个时代，欧洲的建筑元素都是尖顶、曲线，巴洛克……歌德大殿的不规则外形，特立独行的外立面，惊悚骇俗。

这里至今还是斯坦纳一手创立的人智学工作总部。

迈上台阶，人们鱼贯地从大殿敞开的“嘴巴”进入其内。它的外形，完全模拟人类头骨框架。正确地讲，是一具剔掉了所有皮肤肌肉和筋膜的头骷髅。

大殿匀称分为左右两部分，主门之上，是水泥制造的颞骨和颞骨，正上方是额骨，顶部为颅盖。在相应比例位置，有代表人类眼睛耳朵的空洞，装饰成窗户。大殿毫不隐晦地象征——我是坐落在大地之上的巨型人头。人一旦进入，瞬间被它吞噬，进入神秘怪诞的世界。

这个奇异造型以强烈震慑感，完全摧毁了人们对于庄严殿堂的常识。不过进入之后，并不恐怖。它内部雄伟坚实，布局规整，让被吞噬进来的人，不由自主安静下来。扑面而来的色调，是温馨的粉色鹅黄等暖色（模拟人的口腔和咽喉粘膜吗？），灯光柔和地面雅洁，十分宜人（口腔卫生很不错啊）。

我在世界各地，凡看到建筑物，都要尝试判定它的方位。不过依山傍水的外国建筑，常常端不端正不正，

歌德大殿是一个例外。它正门朝西，殿内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各呈半球状，代表着人的大脑结构，也象征地球的东西半球。

斯坦纳天才地把建筑变成了富有象征意义的童话。人们在无意识中接受了强烈暗示：人类是紧密连接的整体，东西方互相依存密不可分。

在歌德大殿的漫步，像沿着人的脑回路，在巨人的神经中枢游走。这比喻说来可怕，实际并无狰狞违和之感。大殿内部，犹如胖娃娃的温暖肉身，所有拐弯抹角处均是带有稚气的圆润曲线。高处的彩色玻璃窗，把自然光的颜色和触感滤得柔和细腻，让混凝土涂层笼罩在温暖暖意中。朦胧光影，让你生出小鸡身居蛋壳内的安全感，激起神秘感动。

我不安分地跑来跑去，一会儿走出这个门，一会儿钻入那个大门，用已知的头颅解剖学知识，一一对应大殿的结构。它的主体分为两层，有楼梯通往上层主会场。途中，从蓝框玻璃中透视山野，如同人的眼眸微睁。楼梯最上层，经过暗红的彩色玻璃窗构成的空间，意味着从这里你离开自然开始进入心灵世界。主会场的形状

说方不方说圆不圆，有1400个座位。两侧各有七根柱子，宏大的有吊顶，设计巧妙，听觉极好。

下层有两个小会场，办公区色彩缤纷。会客厅黄色，走廊粉红色，卫生间鹅黄色……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餐厅，一是它被涂成辣椒般的红色，二是所供应的冰激凌均为有机食材制作，极为好吃。

和随处可见的精雕细刻和色彩精心搭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侧主门厅和通往二层的主楼梯室内面，直接以混凝土的灰白本色示人。细看似乎还遗有工匠涂抹水泥时不均匀的毛糙擦痕。

我悄悄问工作人员，是否大殿修建到这儿，经费不足，改用清水混凝土，以节约成本？

陪同是位热心大妈，耸耸淡淡眉毛，说，不是经费的问题，是特地留下这种质朴的原生态。这与斯坦纳对空间色彩的定位有关。他认为色彩与宇宙结构和人类心灵，都有直接关联。色彩能够激发人们的心灵力量，从而加强对更高层次知识的理解。当时，在建筑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化的包豪斯学派，清冷理性硬邦邦，直线条

故乡祖屋后院一片林子里有两棵老柿子树，每到秋天，一树树斑斓的柿叶，在风中呢喃，恣意摇曳，很是养眼。那些熟透了的柿子，一个个红彤彤如大红灯笼满树满枝挂着的时候，也是母亲最为开心的时节。母亲常将熟透的柿子摘下赠与左邻右舍分享，慷慨的幸福和分享的喜悦写满母亲和善的面庞。2016年回老家，我和哥哥、姐姐到祖屋看了看，老柿子树仍硬朗健在，只是当年喜爱它们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

2006年平安夜的早晨，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姐姐们才贴在母亲耳边大声告诉她得的是什么病，老人听后顿时一脸释然。从不抽烟、偶尔喝点小酒、生活极有规律的母亲得的竟是肺癌。这让我们多少有点意外也于心不甘，其后虽多方求医，无奈回天乏术。我们兄弟姊妹商量决定：保守治疗，不手术、不放疗、不化疗，让母亲生命最后时光，享有该有的尊严和质量。

母亲是坚强的。兄妹八个，母亲排行老三，是家中独女，外公外婆视若掌上明珠，以至怕私塾先生责罚，竟连书也没让她读——这是一生要强的母亲对外公外婆唯一的埋怨。自打17岁走进任家，母亲便告别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奶奶过世得早，她早早挑起“长嫂如母”的重担，起早摸黑，忙里忙外，出庭院，下厨房，将爷爷、父亲和两个叔叔四个老少爷们的饮食起居料理得利利落落。日常缝洗浆晒操劳之余，还帮着耕地种菜，养鸡养鸭。原本暮气沉沉的家，硬是让母亲操持得风生水起，直帮到两个叔叔相继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赢得了乡邻们的一致夸赞。

母亲的吃苦耐劳和能干，在远近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随着我们五个孩子的相继降生，头顶“光荣妈妈”光环的母亲，又一头扎进新一轮操劳与辛苦之中。父亲长年工作忙，少有精力顾到家里，养育我们的任务自然落在母亲的肩上。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一家老小在吃糠咽菜中度日，母亲宁愿自己喝凉水，从牙缝里省下点滴滴，也从不在家人面前叫苦喊怨。同样度日如年的外婆，多次捎话让母亲带孩子们回娘家过一段时间。倔强的母亲不肯，发誓一家老小“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拗不过母亲的执拗，外婆只好让大舅不时匀些粗粮送来接济青黄不接的家。此后，日子虽稍稍好过些，母亲仍时常在劳作之余，勤拾田埂地头的爬根草，还会到别人收割过的田地里捡拾谷穗草，翻寻田垄里落下的山芋、土豆等聊补家用。在越堆越高的柴火堆面前，母亲的身板变得越来越瘦小。母亲在灶膛里、暖火盆中点燃的柴火，成了那个年代一家老小可以紧紧依偎的温暖臂膀。母亲用她乐观向上的精神，带领我们家度过了一个个困苦日子，而那些支离破碎的日子却因了母亲的勤劳、坚韧显得格外幸福、明亮。

我在母亲临终前的那年深秋回去陪过老人一段短暂时光。很少回忆过去的母亲，跟我唠叨起了陈年往事，忙过年是她多次提及的。腊月，酿米酒、蒸糯米、做炒米糖、磨豆腐、掸尘迎新等等，是母亲一年中最忙碌也是最快乐的事。家乡年俗，孩子们大年初一早晨穿着新衣穿新鞋过新年。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五个孩子的新鞋、新衣上身穿何容易。母亲的女红在家乡是出了名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时装设计师。为了过年，母亲从夏便开始忙了——先是将各方搜过来的碎衣零布用糨糊粘起来，反复晒干后，依各人脚型裁剪成相应鞋样，再用闲暇时间，纳成一个厚实温暖的鞋底。无数个夜晚，豆黄青灯下，母亲穿针引线的情景历历在目。她做的鞋曾被左邻右舍的姑嫂姨婶们当作模板。我排行老么，我的新鞋或新衣，母亲也往往是在年夜饭后才缝完最后一针。心灵手巧的母亲为了让新衣看起来挺括，会烧上

硬着陆，千篇一律。歌德大殿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室内家具、灯具、门窗、楼梯扶手等，基本上都是折线和曲线，流露情绪表达温暖。这样才能让人放松，进入思考。

斯坦纳和他的追随者们，力图用歌德大殿的结构和一切细节传输这样的理念——人与自然之间，地球东西方之间，人的头脑与身体之间，要找到有完美结合的平衡支点。

遥想那时，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不过，上帝死了之后，人还要继续活着。那么，人该如何活下去？当时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都认为自然科学只能研究物质世界，而任何涉及精神生活的研究只能是宗教信仰，科学无缘言说。

斯坦纳认为：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精神领域。人的精神自由和独立，是精神发展的首要条件。通过适当的教育和自我改造，最终可以培养出具有完全开放的胸襟，既不盲从也不随意拒绝的新人。当人的内心有所需求，知识和智慧就会涌现，获得精神世界的共鸣，获得具有超越物质、欲望和情感的洞察与判断力。结合与生俱来的智慧和本质达成自我，找到自我定位和人生方向。

斯坦纳一手设计的脑型建筑，便是为这个理念所做的形象注脚。我轻轻抚过大殿中的木雕，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流淌和无数手指的触摸，让它们有了旧丝绸般的生命。它们温热而光滑，好像斯坦纳的灵魂注入其内。脑型建筑，成了他独特思想的辉煌容器，是他哲学观念的立体表达。

一大壶滚烫的开水，倒入平底搪瓷碗中，将新衣衫一一熨平整好，显得格外不同。守岁之后，她还会在早已进入梦乡的儿女的枕头底下放上几张崭新角钞——我们心仪已久的压岁钱。初一大清早，放好开门炮仗，母亲便将卤好的五香茶叶蛋一碗碗分好，让我们趁热给左邻右舍送去拜年。病中的母亲回忆起那个物质匮乏却情意满满的年月，满是皱纹的脸上会漾起难得的笑容。

上个世纪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盛行的年代，身为公社领导的父亲，面对上级来人或下级来访，只要到了吃饭点，便常在家里茶饭待之。即便是粗茶淡饭，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负担。为此，母亲想方设法节衣缩食、开荒种地，贴补家用。房前屋后的河塘、竹林成了母亲的家畜饲养场；驻地附近一片撂荒地，也被母亲改造成菜地，起早贪黑种上各种瓜果蔬菜。由于经常来人吃饭，计划配给的粮食难以维持，我们便时常依赖母亲种的山芋干、南瓜饭、黍米汤圆果腹。物质供应匮乏的年代，母亲私下也偶有怨言，但从不在脸上，她以自己的聪明和热情，尽情招待来客。频繁的接待让父亲单位里的同志过意不去，戏称我们家是“人民公社小食堂”之余，多次提出要给一点粮票和钱款补贴，但总被母亲以“吃好粮票别嫌怪，公家的便宜不能占”婉言谢绝。母亲的任劳任怨、好客和能干为她赢得了“阿庆嫂”的美誉，在当时，这可是对能干家庭主妇的最好夸奖。

母亲对我们几个儿女要求也是宽严有度。未读过书的母亲对我们读书方面提出的要求，总是尽可能满足，别则是能省则省。至今清楚记得，小时候，光连环画就给我买了百多本，但我年少时走东家穿的外套有时还是向邻居家借的。大哥上高中时，社会上流行海魂衫，爱美心切的大哥写信央求在省城工作的小舅给买了一件。收到衣服后，大哥兴奋之情可想而知，但只敢在学校里显摆，从不敢在家里穿。纸终究包不住火，不久这事不知怎么被父母知道了，气得父亲拿着竹扫帚要狠揍大哥，被母亲拦下。母亲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数落，让还想争辩一番的哥哥彻底没了脾气——彼时小舅刚工作不久，且正和女友谈婚论嫁，手头之紧可想而知。此事最后以大哥海魂衫被没收，每月的饭钱被扣至还完购衣款而告结束。

每年暑假，雷打不动要我们回乡下舅舅和叔叔家，帮助干力所能及的农活，是当时家里惯例。母亲这么做，一是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本，吃得苦，经得住累；二是让我们在劳动中增强生活本领，经风雨见世面。所以，每每听到乡亲们夸赞我的哥哥姐姐们干得一手好农活，母亲很以此为骄傲。清白做人，踏实做事，更是父母亲营造的不变家规。父亲后来调到区和县上工作后，仍常有人来看望，来人少不了带些土特产，基本都被母亲挡在了门外。“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是母亲常唠叨的一句话——这么做不是不尽人情，主要是大家的日子过得都紧巴，不能再给人家添负担；至于那些上门求父亲办事帮忙的就更不能收，“不收，你父亲能帮的帮，帮不了的也没负担。”母亲用自己朴素的言行时刻教育影响着我们也为父亲一生清廉工作把好了妥妥的“家庭关”。及至后来我们兄弟姐妹相继走上不同工作岗位，母亲每见到我们，总不忘反复印儿几句，要求我们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做个能安安稳稳睡觉的人。

2018年秋天，我又回到故乡。再次站在老柿子树下，看到老柿子树上片片斑斓的树叶在秋风暖阳中缓缓凝固，欢舞飘落，我像看到母亲因为游子的归来，借助风的手不停地在我的脸庞上亲吻抚动。那些在风的琴声中低吟浅唱，缓缓移动着舞步的落叶，正静静地诉说着自己一生的美丽。斑斓的落叶没有哀愁，她懂得如何在秋风中欣赏自己，抚慰儿女：一朵红晕，一声感叹，一份誓言，一片深情，一生挚爱。那是风中的母亲写给我们这些儿女的诗。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